

# 方志哲學

耿俊杰 著



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

# 方志哲学

耿俊杰 ©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方志哲学 / 耿俊杰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9.11  
ISBN 978-7-5643-7226-2

I. ①方… II. ①耿… III. ①方志学 - 哲学理论  
IV. ①K290-02

-----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59139 号  
-----

Fangzhi Zhexue

方志哲学

耿俊杰 著

责任编辑 郑丽娟  
封面设计 原谋书装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西南交通大学创新大厦 21 楼)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xnjdcbs.com>

印 刷 四川煤田地质制图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mm × 230 mm

印 张 13.75

字 数 219 千

版 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7226-2

定 价 6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 目 录

导 论 / 1

## ■ 第一部分 方志编纂学 / 23

第一章 重申方志的地理学属性 / 25

第二章 方志文本史批判 / 38

第三章 方志编纂学史批判 / 60

第四章 论方志编纂学 / 74

## ■ 第二部分 纯粹方志学 / 85

第五章 论纯粹方志学的研究对象 / 87

第六章 论纯粹方志学的分科体系 / 104

第七章 论纯粹方志学的研究方法 / 117

第八章 论科学的方志的写法 / 127

## ■ 第三部分 方志哲学 / 131

第九章 论方志哲学的基本思想 / 133

第十章 论方志的现代性 / 141

第十一章 论政区复杂系统的突现性 / 149

第十二章 论方志学的终极意义 / 158

第十三章 论多元方志 / 165

第十四章 论方志学者的使命 / 171

■ 第四部分 广义方志学 / 177

第十五章 论方志的可读性 / 179

第十六章 论方志的传播模式 / 187

第十七章 论方志作品的质量管理 / 196

第十八章 论地方综合年鉴的创新 / 204

■ 主要参考文献 / 212

■ 后 记 / 214

## 导 论

根本上说，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哲学研究的对象，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从最大的问题到最小的和微不足道的问题，从宇宙的诞生和构造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正确行为，从自由、死亡和永恒这样一些终极问题到日常饮食问题，一切都可以成为哲学思考的对象。

——汉斯·约阿西姆·施杜里希《世界哲学史》

方志从哪里来？方志是什么？方志向何处去？这是本书的三大核心问题。

1897年，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在南太平洋塔希提岛上创作了油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画名中这三个问题都是哲学的最高问题。我将这三个问题引入对方志的思考中来。可喜的是，这完全合适，仿佛找到了一双合脚的登山鞋，穿上它再去攀登方志学之高山，寻觅方志思想之路，就会更加稳健而持久。高更认为，绘画的本质不是在简单的写生中获得的一般经验，而是经验的创造，这与本书所要表达的方志思想暗合：方志不只是简单的记录，它还有更高层次的心灵创造。

### 一、方志的存在

方志在中国显然已经成为一种客观的存在。

#### （一）方志的地位

方志在中国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这首先体现在官方的重视上。方

志的产生与官方有重大关系。《周礼》记载，小史“掌邦国之志”<sup>1</sup>，外史“掌四方之志”<sup>2</sup>。小史、外史都是政府的官职名，是司礼之官。北宋司马光、清代章学诚都认为《周礼》就是方志的起源。即使这不是真的，至少也可以说明掌握地方情况是官方的需要，这与后世官方对方志的需要是一致的。这也至少可以说明，方志的起源是有官方意识的，至少官方意识是其起源意识之一。从此开始，中国历代统治者由于治理需要都对全国各地的情况十分关心。要了解各地情况，就要由各地报送地情材料。起初的上报材料，就演变成了后来的方志。起初是由官方最高机构按各地上报的地情材料直接编写全国范围的总的地方情况书。秦时有地图，汉代规定各地上报“计书”。宋代对方志开始高度重视，虽然没有诏告各地修志，但经常要求各地报告地情、地图等。由于朝廷的重视，宋代修出了许多区域性的方志。到元代时，朝廷颁发了《大一统志凡例》，成为中国中央政府制定的第一个规范性的修志文件，在方志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明朝永乐十六年（1418年），“诏纂天下郡县志书”<sup>3</sup>，这是中国历史上朝廷首次明确诏告各地编修方志。到清代，由于官方的推动，修志更是一度达到了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也都是全国统一修志。这种现象，在世界列国中是绝无仅有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虽也有方志编修，但都是受中国的影响，且其规模和连续性都远不能与中国相比。

其次，体现在学者文对方志的关心上。中国自古以来的学者，大多对方志有些兴趣。文学家范成大、史学家司马光，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都参与过方志编修并提出了一些方志思想。清代史家章学诚更是将方志开拓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到梁启超则将章学诚的方志研究明确称为“方志学”，对方志学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民国时期的鲁迅也经常阅读方志。学者文对方志的热衷主要是由于中国学者天然地关心各种学问，这是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方志自然是其关心的重要方面。

最后，体现在学术传统的绵长上。梁启超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sup>4</sup>中国最早的史书是《尚书》，约成于公元前5世纪，那么方志算到今天已经有约2500年的时间了。如果就按最早出现“方志”一词的《周官》算起——《周官》可能成书于魏文侯时期（公元前472—前396年）<sup>5</sup>——那么已经有2400多年了。如果从现存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方志作品《华阳国志》算起——据刘琳考证，该书可能成于东晋永和四年至十年（348—

355年)之间——那么方志到今已经有1600多年了。方志在中国是个非常绵长的学术传统。

## (二) 方志的数量

明代开始全国普遍修志,到清代已经达到全盛。明清以来,要求全国各个县级以上的行政区都要编修方志。至今,凡是在中国管辖内的县以上的行政区中,绝大多数都有方志。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现存1949年以前的历代方志8264种<sup>6</sup>。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截至2005年11月,全国省、市、县三级志书已正式出版4808部,这还只是总规划5445部的88.8%。<sup>7</sup>同时,各地一直都在广泛编纂行业志、部门志、特色志、乡镇志、村志等方志作品,数量一般应在规划志书的几倍或几十倍之上。因此,全国新修的方志当在数万部之上。如此庞大的数量表明方志在中国是一个极广泛而庞大的存在,其背后也有一个非常庞大、非常活跃的学术团体在活动。

## (三) 方志的独特性

如果认为只有中国的这种形式才叫方志,那么它肯定是独特的;但如果将方志定义为对区域情况的记载,那么很显然,形式问题就不再重要,即使凭感觉,也可猜知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会有类似的图书。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的长篇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提到,女主人公苔丝的父亲约翰·德比之所以知道自己是贵族的后代,就是一个当地的地方历史学家在偶遇时告诉他的。这就表明地方史研究在英国可能是很流行的。国外对区域地理和历史的记录,甚至也如中国方志一样是广泛而系统地存在着,例如美国犹他州的29个县都编修了县史<sup>8</sup>。

那么中国方志的独特性在哪儿呢?一是体例的独特性,二是历史的绵延性,三是组织的统一性和广泛性。这三个特点合在一起,确实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相比的。特别是时间的绵延性和空间的广泛性,使方志发挥了最重要的史料库的作用,这一点,是今人之所以重视方志的最重要的原因。

## (四) 方志的价值

古人对方志价值(或功能)的论述比较驳杂,但范围并不宽,有些

很有价值，但大多都是十分零散的，只言片语，不成体系。到20世纪80年代，方志界将方志的价值概括为存史、资治、教化三点。这几乎成了对传统方志价值的最高概括。存史是中国人极感兴趣的爱好，方志的这一功能是自然而然的。官方之所以重视修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要它起到资治的作用，方志记载的方方面面的内容，可以说都是国家治理所需；虽然还只是简单的记录，但基本上是可以满足当时也同样处在简单的治理模式下的封建政府。也就是说方志记录的简单性和政府治理模式的简单性是相适应的。教化是古代政府“防道其民”<sup>9</sup>的重要手段，分“文化”和“武化”两种，方志属于“文化”的范畴。这实际上就使方志的价值变得很狭窄，也就严重抑制了它的活力和应然的理想。

### （五）方志的向往

方志的向往就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比如仓修良先生认为，“两汉魏晋的选举制度促使人物传记盛行”<sup>10</sup>，这就是一种方志的时代精神。方志可以有什么样的向往，就说明它所处的时代希望或允许方志孕育什么样的精神。在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方志自然也向往自由与自在。反之，在一个专制封闭的时代，方志自然就只能循规蹈矩、一板一眼。过去，方志的向往就是为官方统治提供基本情况，它也基本上实现了这一目标。而今方志的向往是建立方志学，甚至使方志学成为独立学科。这虽然呼唤了许多年，但是却一直没能实现。这倒不是因为学科批准单位不予重视，也不是因为学者不重视方志学，而是因为所谓的“方志学”无法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方案。这才是深层原因。当今所谓的“方志学”，本质上只是方志编纂学，它只能解决记录哪些地情和如何编写的问题，而解决不了区域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所谓的“方志学”是没有问题的学问。一个没有问题的学科是不可能成为生命力旺盛的学科的。

要成为一“学”，它就必须有要去解决的问题，并且具有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而以往的方志只是知识的“堆栈”<sup>11</sup>，这使它无法成为一“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将来的方志就一定不能成为独立学科。既然有这一向往，就说明时代精神有这种需要，就要研究并解决这一问题。如何构建独立的方志学科，也正是本书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

## 二、方志的困境

方志和方志学发展到现今，已经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难题，身陷困境，只是由于人们习惯于这种困境并且缺少开拓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对此缺少敏锐的感知，所以并未能意识到或充分意识到这些困境的存在。他们总是朦朦胧胧地感觉方志很重要，却又无法知道它到底重要在哪里，当方志在现实中根本体现不出重要性时，他们就变得消极悲观，最后只能以“对历史负责”这样的措辞来自我安慰，导致方志只能局限于“存史”这样的狭小领地。这些情况都是方志和方志学本身的困难所致。

### （一）没有问题的困境

针对方志所做的研究，传统上称为“方志学”。这一概念从梁启超开始，梁启超又认为方志学从章学诚开始。但章学诚所研究的方志学，以及梁启超和后世学者所谓的方志学，本质上都只不过是方志编纂学。方志编纂学发展到现在，可以说已经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了<sup>12</sup>，因为它已经近乎完备。在过去如果说它有问题的话，那么可以说，它的主要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记什么，另一个是如何记。事实上，方志编纂学在过去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两大问题展开的。甚至可以说，方志编纂学也就只能围绕这两大问题展开。发展到现在，这两个问题也几乎解决得差不多了。旧的东西已经完善，再也没有发展的空间和可能性了，这是当前方志和方志学所面临的最严峻问题——没有问题。有些学者提出要将方志学建成独立学科，但因为方志编纂学自身已经没有重大问题要去研究，因此方志学想建成独立学科或一级学科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 （二）无法建成独立学科的困境

方志学的根本困境乃是：如果它坚守固有的模式，它就只能自限于方志编纂学的范畴，这也将使它永远只能保持记录的能力，而无法实现成为一门高级学科的理想；如果它向高级发展，即转变研究对象，那么在现代学科的思维模式下，它就只能和必然地消解在区域地理学或区域历史学的学科之内，根本不具有独立的意义。现行的思想基本上就是把方志学当成历史学科来看待，这就与它的方志学理想在根本上产生了矛

盾。虽然地理学对方志学的对象研究上更具有本真意义，但同样，它也会消解到区域地理学的范围内，也就是说，方志学的独立性与区域地理学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对于这一困境和矛盾的研究，也许要持续很长时间，这个困境和矛盾的化解，也是方志学或方志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未来最为重要的任务。

但是，由方志编纂学提供的产品——记录的方志——确实具有恒定不变的基本价值，也就是，它不管理论如何变化、哲学思想如何看待，它就只是记录。正如农业生产一样，不管工业与服务业，甚至第四产业（信息业）如何发展，它都有最基本的作用：提供人的最基本的需要。

这个根本的困境导致它无法建成独立的学科。要建立一个学科，必须要有一定的基础。安东尼·吉登斯在《社会学》一书中指出：“理论是所有学科必不可少的部分，因为它使我们能够提供解释而非简单罗列一系列的事实。”<sup>13</sup>方志和方志学在发展了2000多年之后，仍然没能发展出自己独有的理论，很难谈得上对理论有什么贡献。要建立方志学，必须要有科学的思维，即理论思维，但这恰恰是方志和方志学一直以来根本就不具备的。它只为其他研究和运用提供原材料，还没有发展出一套认识事物的科学的思维，也根本就不具备发展出这种思维的能力，这是仅仅作为记录的方志和仅仅研究编纂的方志编纂学的本性所决定的。最重要的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具有高效解决问题的能力。物理学是个大的学科，但是当其光学、微波学、量子动力学等子学科具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时，它们就成为独立学科了。而方志学并不能独立且高效地解决区域内的任何重大问题。这些事实都表明，以方志编纂学的能力，想要建立方志学，虽然有强烈的愿望，但却根本不可能。甚至可以说，一直以来方志学都与现代科学相距甚远，它从来没有提出过深刻的、有重要价值的见解。

### （三）单纯记录的困境

方志从始至今的呈现方式都只是单纯地记录，因此只能称为记录的方志。说以往的方志只是记录的方志，并非说这方志本身没有变化。方志自身当然在变化。在记载内容的数量上，它记录的内容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单一到多种、从部分到全体。在形式的数量上，各种体例、

体裁的出现，都显示着方志在形式上的变化是非常丰富的。但从更高的层面看，这种变化只是量的变化（趋向于越来越多），没有质的越迁。它的一切变化都没有超出单纯的记录这一形式。方志记录的内容的多少可以比方为超市里的货物，方志的体例、体裁形式等可以比方为超市里的货架。货架可以有多种摆法，可以花样百出，可以加上灯光效果，可以打上漂亮的广告，但这并不改变货物的整体情况和基本事实。方志也是如此，虽然在形式上千变万化，但其记录的内容却都相差不多。因此这里说以往的方志都只是简单的记录，只能称为记录的方志。因为它只是记录式的，这就导致方志只停留在浅层的观察层面，无法深入事物的本质。从进化的角度看，方志从其产生就静止了。

#### （四）认识对象严重偏离的困境

梁启超所谓的方志学，实际上只是方志编纂学。中国过去的史学也与此类似，其实只是历史编纂学，并没有进入现代意义的历史学。方志学只是研究一部方志应该记什么、应该如何记这两大问题，方志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编纂问题，这是由它过去所处的人文环境所决定的。

有些学者认为方志学还包括其他内容。他们将方志学分为方志编纂学、方志管理学、方志应用学、方志史等许多分支。但仔细想来，其中存在许多问题。我们可以从与其他学科的类比中镜鉴到真实情况。如果我们把物理学分为物理编纂学、物理管理学、物理应用学、物理史等分支，问题就判然若分了，因为这些显然都不是物理学的研究范围，更不可能是物理学的研究对象。物理学的认识对象是十分清楚的，就是物质的结构和运动。物理学的研究目的在于发现规律，它外围的东西，诸如编纂、管理、历史，甚至科技的运用等都不是它的认识和研究对象，而仅是它的辅助和延伸，不是根本目标，也不具有根本意义。同样，方志学的认识对象就更不应该是编纂、管理、应用、方志史等内容。那么方志学的认识对象应该是什么呢？这就是本书的核心要点之一。

过去一切“方志学”都是以方志编纂为研究对象的。而这很可能严重偏离了方志学应然的认识对象。它的研究对象只是罗列哪些事实并探讨如何罗列。再次以超市货架为喻，货架的承载对象只是货物，它只发挥摆出哪些货物以及如何摆放这些货物的功能，至于更高层面的东西，

如货物的商品本质、超市与消费者的关系等，它是不追求的，也是追求不了的。因此可以说，方志学的研究对象一直是没有认准的，一直以来都是在舍本逐末、缘木求鱼。而本书认为，方志学的认识对象应该是特定区域空时整体，目的在于发现这个特定区域空时整体的规律。这个认知如果确立，我认为将开启方志学上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它将彻底改变方志学的认识对象。

### （五）难以解决现实问题的困境

过去所谓的方志学在事实上只是方志编纂学，它只研究和解决方志记什么和怎么记的问题，它对区域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并不去研究和解决，这就导致它没有产生解决区域问题的能力、方法和思想。方志编纂学或传统的方志学是不解决现实问题的，也是没有能力解决现实问题的<sup>14</sup>。在这种情况下，它还想发挥所谓的资治功用就成了水中捞月、雾里看花了。

### （六）数量庞大却思想单薄的困境

方志在编纂数量上的庞大与方志编纂学思想的单薄相比，其反差之大，总会让人目瞪口呆。但仔细想来，这也是中国传统学术十分突出的现象。中国的史书写得汗牛充栋，但却发展不出科学的历史理论，上升不到历史哲学的高度；科技发明比比皆是，却发展不出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因此再多的发明也总是停留在原始状态。中国的方志也是如此。清代以前没有方志学的专著，到清代时有了章学诚的研究，但是他走偏了路线，把方志当成了历史去研究。如果姑且就把章学诚的方志思想全部当成方志思想，其理论也仍然并不丰富，仅是如何编纂的理论。章学诚之后的学者，虽然也在方志学上做了许多努力，但基本上没有超出方志编纂学的范围，其思想仍然缺少现代思想的深度。

### （七）逻辑混沌的困境

以往所谓的方志学，其内部的混沌程度远远超乎有过科学思维训练的人的想象。这种混乱在方志之初就有显现，但因为初始阶段的简单性，这种混沌并不影响它功用的发挥。在封建社会，由于它的功能是清楚的，因此它的混沌还算是有点道理的，即，社会思维本身就是混沌的，它没有

理性的指导，它也不可能有理性的指导，它只是凭感性在做方志。方志的创作主体的思维是混沌的，方志的接受者的思维也是混沌的，因此大家都无所谓。封建时代是非理性的时代，因此这种混沌是可以理解的。但发展到如今，仍然存在这些混沌，就显得不可思议了。当然，深层的原因还是可以找到的，但这不是本书的目标所在，因此不述。这里只指出几个常见的逻辑混沌问题。

1. 方志属于历史还是地理？这是它混沌的根源，是一切混沌中最大的混沌。这也与中国学术上历史学和地理学一直不太分明有很大关系。在学科归属还不清楚的情况下，中国古代就不可能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方志学。

2. 为什么会有断代？如果方志是历史，那么断代是很自然的；如果方志不是历史，那么为什么还会有断代？古代中国修出了大量的断代史，但是在方志上却一部断代志也没有。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忽然出现了大量的断代志。既然都能断代了，那不明显就是历史吗？可是在已经断代的情况下，人们还在强调志不是史，这不是很奇怪吗？

3. 为什么要述而不论？如果是志，是纯记录，那么当然可以述而不论。但常常说“志属史体”“志乃一方志之全史”，既然都是历史了，为什么还不允许“述而有论”呢？“述而不论”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回答。

如此等等，许多混沌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 （八）价值观缺乏现代性的困境

存史、资治、教化这方志三大功能（价值）的提出，是对过去方志功能的总结。这三大功能与旧方志是相合的，因此可以说是一个有价值的概括。但我们也应看到，它不是在现代视野下提出的，如果在当今和未来还是如此要求，那方志将仍囿于过去的藩篱而永远无法达到现代的要求，永远无法闯出自己的新天地。

中国的方志，乃至外国的类似图书，甚至人类的一切图书，在事实上都起到了存史的作用。章学诚有“六经皆史”说，李敖有“凡书皆史”说。现在研究古代的历史，方志发挥了重要的史料作用。方志起到了存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也存在问题。一来，方志虽然实际上承担了存史的功能，但方志本身是否就应该承担存史的功能？这是完全不

同的两个问题。正如我们知道《诗经》也在某种程度上保存了一部分史料，但《诗经》本身是否应该担负存史的任务？二来，假设方志应该承担存史的任务，那么它是否是唯一负责的一方？三来，如果方志把存史当成重要任务，那么它还可能向更高层次发展吗？其实在现代，尤其是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方志的存史功能已经被弱化了。在现代化的今天，只承担存史任务的方志，已经失去了拓展价值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说，存史的功用要求对方志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抑制作用。

资治（或资政）作为方志的重要功能，明显是古代封建社会的结果，也就是说，它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而是以官方及其治理为中心的。方志有“资”的功能，但肯定不完全是为了“治”。

教化则存在更为严重的问题。“教化”与“文化”一词类似。刘向在《说苑》中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sup>15</sup>在这里，“文化”是一种强制性的文化教育。“教化”一词，本质上与古代那个“文化”一词相似，是一种强制的行为，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慢行为。“教化”在本质上是统治阶级对群众的统治教育，而不是自在自为的文化滋养，因此它根本不具备现代意义。但“教化”是与古代封建社会相符合的，它的价值是与旧社会的价值相匹配的，基本上达到了它的目的。当时的志书，甚至一切图书都要求具有这个功能，这也不足为奇。因此，“教化”这一功能是过去可以具备而未来不应该具备的。在未来，它必须纡尊降贵，回到与众知识、众人民平等的地位。

### （九）失去读者的困境

近40年来，方志正面临着一个越来越严峻的问题，那就是方志越修越多、越修越厚，但却越来越没有读者。有学者认为这是新媒体的冲击造成的。新媒体的出现当然对纸质图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仍然解释不了这个问题。这是因为：第一，即使在新媒体时代，纸质图书仍然是人们阅读的重要选择，而选择方志进行阅读的人却非常之少；第二，在新媒体时代，一部分人不再阅读纸质图书，但电子书仍然是阅读的选择，而选择阅读电子方志的人也是少之又少。因此，新媒体的冲击无法解释方志读者少的问题。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在古代，方志几乎是读书人了解地情的必读书，那时的读者也以阅读方志作为学习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事实上，当今的读者对方志产品仍然有强烈需求和期待，但当他们

看到志书时却觉得那不是他们想要看的。读者希望看到的是简洁明了的作为地理书的方志，或有思想有研究的方志，但这方面的方志产品却一直没能发展起来。

### （十）没有终极追问的困境

我们在方志的各类文献中，几乎看不到终极追问。甚至可以说，在方志和方志学中，根本就没有终极追问。这是方志和方志学一直停留在浅表层面的根本原因。没有追问就没有思考，就不会深入；没有终极追问就没有终极深度的思考，就永远不会深入事物的本质。什么是终极追问呢？终极追问就是人生的意义问题。对方志的终极追问，就是追问方志对人的终极意义，其中包括一系列子问题，如：还有比现有方志学更高的形态吗？方志将向何处去？方志到底能给人带来什么？方志的终极价值在哪里？人能摆脱地理决定论和历史决定论吗？这些问题，几乎很少有人思考过。方志工作者、方志学者如果始终不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想见他们对方志的思想深度如何。他们永远只能是奉命行事、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不断轮回。在这种状态下，方志永远不会有超越性。

## 三、将哲学引入方志的意义

要解决方志和方志学中存在的上述困境，仅从方志编纂学视角及其外围视角，诸如方志运用学、方志管理学、方志收藏学等，已经无法办到，因此就有必要引入一个更高的和最高的观察视角。更高的视角就是科学，本书称为“纯粹方志学”；最高的视角就是方志哲学。方志和方志学上面临的诸多困境和诸多问题无法破解，很重要的原因乃在于方志编纂者和方志学者对近代的世界学术思想了解和吸收得远远不够，很容易沉浸在方志的“中国特有”“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旧情怀中走不出来。要走出旧情怀，破解方志问题，将科学和哲学引入方志学是最好的途径。

首先，哲学能为方志研究提供最高的视角。“哲学”一词源出希腊语 *philosophia*，是“爱智慧”的意思。一切智慧都是哲学的思考范围。在思考对象上，它是无所不包的，一切事物都是哲学的研究对象。像科学这样如今最显赫的学问，其研究对象最初也是哲学的思考对象，只是后来发展得太出色而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而已。牛顿的物理学当初就叫《自然

哲学的数学原理》。各种学科大多都有过与哲学相伴或以哲学为依归的经历。哲学是一切科学甚至一切学问的母体。德国哲学史家施杜里希在《世界哲学史》中写道：

根本上说，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哲学研究的对象，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从最大的问题到最小的和微不足道的问题（当然，在深刻的思想中，什么是微不足道的呢？），从宇宙的诞生和构造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正确行为，从自由、死亡和永恒这样一些终极问题到日常饮食问题，一切都可以成为哲学思考的对象。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按照通常的划分方法有条理地逐一列举出哲学研究的对象，以便于读者对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有一个概括的认识：形而上学研究宇宙整体问题（或超出人的感官经验之外的问题），本体论研究全部的存在问题（这两个领域也和其他领域一样都是相互交叉的）；逻辑学是关于正确的思维和真理的学说，伦理学是关于正确的行为的学说，认识论是关于认识及其界限的学说，美学是关于美的学说；自然哲学讨论自然问题，文化哲学讨论文化问题，社会哲学讨论社会问题，历史哲学讨论历史问题，宗教哲学讨论宗教问题，国家哲学讨论国家问题，法哲学讨论法律问题，语言哲学讨论语言问题；此外，还有经济哲学、技术哲学、金钱哲学，等等。

.....

尽管哲学和其他特殊科学研究的是同样的对象，但是，哲学还是以一种适合于自己的特殊方式与它们区别开来。哲学问题是以一种特有的哲学性的方式提出来的。

.....

哲学还把特殊科学的研究成果综合到一起，从而获得一种统一的世界观。<sup>16</sup>

循着这个思路，既然哲学可以研究一切，那么它当然也可以用来研究方志和方志学。这就证明，方志和方志学是可以有自己的哲学的，甚至是只有在有了自己的哲学之后，它的发展才会更有意义，更有前进的